

近年来,以李春雷、梅洁、一合等为代表的河北报告文学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勇于担当,队伍成军,作品成批,花开四香,彰显出特殊的文体创作态势,形成了备受瞩目的“河北报告文学现象”,这是需要很好认识和研究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接近和理解:

异军突起,河北报告文学果实累累

在这个纷纭的全媒体时代,尽管一本书、一首诗轰动社会的岁月不易出现,但是,事情总会有例外。只要人们给予关注,就会有一些文学现象具有特殊表现。

《河北日报》(2015年4月3日)刊发了崔立秋的文章《河北报告文学新崛起探因》,从“文学性”、“主体性”和“社会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探因”。李朝全在《中国艺术报》(2015年5月25日)刊发题为《记录时代,参与现实》的长文,对河北报告文学创作成果进行了扫描式述评。2015年9月23日,“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河北报告文学现象’研讨会”在河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60余位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及大学教授,对“河北报告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讨:

硕果累累,香远益清 河北作为文学大省,报告文学创作起步早、分量重、影响广。早在抗战时期,就诞生了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反映敌后抗日斗争生活的一部标志性作品;解放后,刘真的报告文学作品《西天取宝记》出版,1981年,她的《一片叶子》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又有傅剑仁、张国明的《千日养兵》和蔡子谔的《原动力的潜层开掘》获得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一合的《黑脸》、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春雷的《宝山》和关仁山的《感天动地》四部作品分获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梅洁的《创世纪情愫》、刘家科的《大爱无疆》、关仁山的《感天动地》、李春雷的《山生》等作品分别获第八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奖项之外,还有一些作品入选各种选本,荣登年度排行榜,或以其他形式广为传播,影响深远。全国第一部多角度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善行启示录》,荣登2014年5月“光明书榜”全国畅销排行第一名;彰显河北独特的精神特色和人文优势的《裴艳玲传》去年首发后几个月销售10万余册,影响波及海内外;根据《红脸》改编的电视剧《国家审计》热播;《木棉花开》红遍大江南北;《夜宿棚花村》入选《大学语文》教材;《摇着轮椅上北大》作为励志经典,多年畅销不衰……

立足河北,辐射全国 报告文学是对现实社会感知和描述的文学表达。对于现实社会重大热点、焦点对象的接近,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特性。作家走进大事件、大工地、大企业,及时反映和记录社会舆情,为人民奉献优质的精神食粮,是河北报告文学创作的新常态。陈冲、一合的《路灯下的SARS》,王立新的《明星书记》,关仁山的《执政基石》,一合的《果实》,李春雷的《根系大地》和《善行启示录》,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等20余部作品,从不同侧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河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崭新成就。同时,河北作家并不拘泥于本土,而是放眼全国,触及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和全局性话题。梅洁的《大江北去》和《汉水大移民》把目光聚焦全国关注的南水北调和移民工程;一合、薛景辰的《红脸》,聚焦中国审计反腐;王立新的《曹妃甸》《首钢大

花开燕赵动四方

——“河北报告文学现象”侧评 □李炳银

搬迁)聚焦科技创新和国企大变革;李春雷的《我的中国梦》,反映党的十八大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先进典型、我国首架航母舰载机“歼15”战斗机设计建造统领者罗阳的先进事迹,在《人民日报》整版刊发,举国关注。

春雷阵阵,春暖花开 身为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的李春雷,当为时下河北乃至全国报告文学青年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涉及领域宽泛,且数量多、质量高、影响广、反映好。近年来,他的短篇报告文学创作更是一枝独秀——文体意识强,艺术感染力强,时代映射力强,市场冲击力强,代表作有《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赶考》《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上百篇。《木棉花开》,声动四方;《朋友》又创三个“第一”,新华社历史上以通稿形式发表的报告文学,这是第一篇;全国各大网站以头条推荐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是第一名;被全国千余家报刊转载,这是第一次。

梯队人才,长效发展 河北文坛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匀称,梯次接近合理、初具规模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其中,既有从事创作数十年的老作家一合、梅洁,也有年富力强,创作激情高涨的中青年作家王立新、刘家科、傅剑仁、李春雷等。近年来,又有一大批青年作家雪小禅、程雪莉、田静、黄军峰等一批网络纪实文学作家等逐步成长起来。他们构筑起了河北报告文学老、中、青三代创作梯队,完善了传承有序、人才接力、长效发展的作家体系。

内外兼修,河北报告文学早春气象探因

河北报告文学继往开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生机盎然的新现象。从我的观察看,主要表现在:

在文体艺术上有追求 河北报告文学无论篇幅长短,虽然也有分野之别,但在文体上大都有分明的个性追求。梅洁的深情细腻、一合的绵密多姿、李春雷的奇妙精简等特点,十分鲜明。那些来自于生活基层的人物故事,引领读者穿越生活表层,抵达生活里层的真善美,通过作家心灵的追思与诘问,接地气、有温度、耐阅读,实现了真实向文学的巧妙转化。

在创作态度上有担当 长期以来,河北报告文学作家脚踩坚实大地,关注热点和焦点问题,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汶川和玉树地震发生后,李春雷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第一时间深入现场,创作了《夜宿棚花村》《索南的高原》《玉树日记》等优秀作品;梅洁不顾年岁,跋山涉水,饱含乡愁和乡情,20多年持续关注南水北调工程,完成关于“生命之水”的文学报告;一合多年潜心用权执法对象的人物生活,赞美崇高,鞭笞丑陋精神行为,书写报告了许多令人沉思的社会生活情景;作为一名政法工作者,傅剑仁连续10多年参与涉法涉诉上访的处理和化解工作,倾听上访群众心声,深究上访案件缘由,成就了他的触及社会敏感题材的《上访》;程雪莉历时5年,采访调查,细心打磨,才有了对历史反思和对英雄歌颂的《寻找平山团》……

在题材选择上有眼光 报告文学是作家个人的文学行为,但由于在很多方面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紧密

联系,就使得报告文学在创作过程中,需要相关对象、部门的积极配合。2012年,反映河北农大果树9301班26名学生15年资助病逝同学双亲的感人事迹的《果实》;2013年,呈现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的《善行启示录》和《善行河北》;2014年,表现领袖与作家深厚情谊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表现解放前夕非凡历史的《赶考——西柏坡感恩》、表现一代名伶大师的《裴艳玲传》;2015年,记述英雄群体奋勇抗战历程的《寻找平山团》,反映全省新农村建设和家庭美德故事的《美丽乡村》和《最美家庭故事》等等,都是在作家选择之后,省作协给予热忱积极协助后完成的作品。这种尊重文学规律,又能够给予必要支持配合的作风,是值得借鉴的。

确立报告文学的重要位置 在这个“生活比想象和虚构更精彩”、“真实很可能会淹没虚构”的全媒体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报告文学的表现力似乎比诗歌、散文、小说更快捷,更直接和更充分。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魏平既是领导干部,又是一名散文作家。她深深意识到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时代现实性,在全面部署文学创作的时候,着重确立了报告文学创作在作协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用报告文学讲好河北故事,发出河北声音的构想,这为河北报告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

打牢报告文学的发展基础 河北报告文学“老中青”阶梯式作家队伍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省作协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挖掘和扶持。他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门的报告文学艺委会,团结凝聚全省有创作实绩的基本作者队伍,并多次举办培训班,邀请名家讲座,采取重点作家推荐扶持制度,将报告文学作家优先推荐进入省文学院;同时,积极为报告文学作家(包括网络写手)提供创作实践的锻炼机会,承担重大选题的创作任务。

记录时代,报告文学的春天已经莅临

尽管河北报告文学成绩瞩目,却依然“在路上”,也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全国一线青年作家的数量还稍显单薄,作品的思想力度有待提升,青年作家作品的经典特质不够,有“高原”而缺少《木棉花开》《朋友》之类的“高峰”,等等。真正具有独特发现思考和精妙文学艺术表达的重量级作品,还是欠缺。即使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家,也有局限和短板需要设法弥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认真探讨和总结的课题。

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此殊荣。写实文学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力地证明了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学文体的根本指向性和巨大影响力,也说明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的艰巨性。不管这次奖项的背后存在什么样的因素,但这是从世界的眼光和角度对写实文学在文体价值作用重要性的再确定,是对这种文体时代影响和趋向的突出指引,是增强我们报告文学作家继续坚定前进的力量。河北报告文学近些年来的收获也说明了这样的事实,使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对报告文学的前景未来有一种美好的期许!

在遥远的滇东北,有一个叫昭通的地方,它属于乌蒙的一部分,盛产贫困和血性,那是我的故乡,也是《万物生》作者沈洋的家乡。云南昭通出作家,在今天中国文坛来说不是新闻,而是共识。昭通作家群,是一个直面现实,贴近生活的基层作家群。昭通为什么会出现作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文学新秀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文学评论界值得关注的问题。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乌蒙群山上的昭通人来说,从来都是一本沉重的大书,沈洋更不例外。这个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镇的人,是典型的乡下人和山里人。那里,极美的山地自然风光与极穷的山民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美。极寒极冷的高海拔山地上,只能出产土豆、燕麦和苦荞。每年冬季,黑颈鹤就会飞过贫困的村庄,在高原残存的湿地上觅食。黑颈鹤是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残酷的一种高贵的鸟,它成为沈洋文学启蒙的最初偶像。贫贱不能移!做一个普通人也要追求高贵的精神生活,成了沈洋这个大山之子最初的人生信条。

这个文学梦,对于像沈洋这样的有才华的山里娃来说,并不是仅为了满足青春期热血的躁动和丰沛情感的渲泄,好梦一场,最后存入青春的纪念册了事的。他们在心中播下文学这颗种子,是要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直至最终结果的,如果不能这样,梦想于他们来说就会代价高昂。沈洋是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师范毕业,重回故乡大山包,在那里,他边教书边写作。文学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手段。昭通为什么出作家?原因在于此。在经济欠发达、相对偏僻闭塞的地方,知识青年改变命运的途径相对有限,文学成为一种可能和期望。在昭通这样一个地级市,活跃着数百人的作家、诗人。文学得以方兴未艾,蓬勃发展,除了这地方十余年来培育的文学生态,更重要的一点,他们企图用文字来实现自我,改变命运。

沈洋从一个小教师,因写作崭露头角,进入市文联,做了秘书长和副主席。他的成功,给昭通的文学写作者创造了典范。沈洋可贵的,是他的不忘初心。他始终跟乡村跟土地跟乡亲,保持零距离。他始终相信,只有生活,能给他的写作提供养分。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对于沈洋,不是空洞的口号,时光倒溯6年,沈洋就以私人名义联系永丰镇,开始体验生活,他不仅身体

力行,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为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构建蓝图,还自编自导自演,并发动3000多农民参加演出,拍摄了电影《我和三甲有个约定》,该电影获得了全国首届“情系三农”微电影大赛优秀作品奖和云南省的多个奖项。2014年,“8·3”鲁甸地震,给昭通所属的鲁甸、巧家两县造成严重损失,2014年9月15日,市委组织部又选派沈洋等17名副处级干部,奔赴灾区,指导和参与灾后重建,沈洋被选派至巧家县新店镇,挂职担任镇党委副书记。他为灾区的重建工作,特别是鼓舞灾民重拾生活信心重建家园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日子,他会在深夜人静时给我打电话,谈灾区,谈文学。直至今日,他依然战斗在灾区第一线。沈洋是生活的践行者,也是生活的拾贝者。

沈洋的长篇小说《万物生》,就是这些年沈洋深入生活的河流从中淘洗出的沙金。

作为农民的儿子,不可能对发生在身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熟视无睹。农村艰难的蜕变过程,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守住青山绿水和乡愁,坚守几十年形成的乡村文明,都是激发作者创作的动力。沈洋在《万物生》这部书写新农村建设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饱满的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长的形象。文雅琪这个人物,是读者过去的阅读经验中没有的乡村人物形象。可以说,这是沈洋心目中理想的新农村人物形象,摒弃性别因素,这个人物身上,有太多作者自己的影子。

据我所知,苹果的升级换代,是近几年真实发生在昭通的事情。昭通,是中国南方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那儿的苹果因品质优良闻名天下。沈洋写的苹果村,是浓缩了的昭通,中国农村的每一次崛起,都带着巨大的历史之痛和现实之难,新农村建设也不例外。农村要新,要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新思维、新技术、新手段、新境界、新视野。这每个新的实现,都得跟千年传统形成的旧抗争博弈,这其实是一场变革。苹果村的变革中,那些困难,那些冲突,那些矛盾,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真实难题。正是深入生活的实践,让沈洋对此了如指掌,从而使一个在借助产业升级实现成功蜕变的新农村形象——苹果村跃然纸上。

当然,沈洋的写作就像他描写刻画的新农村,还走在成长成熟的路上。沈洋的写作,还有稚拙之处,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如何解决结构问题,如何从容驾驭几十万字,都是他今后要面临的问题。

诞生于江南宜兴民间的紫砂,是中国发达的农耕文化孕育出的一个标志性器皿。盛名于宋代,绝非偶然。与宋朝创造了当时世界最繁荣的经济文化、浓郁的艺术风气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崇尚艺术的社会氛围中,文人对紫砂的喜爱,参与其中,无疑对提升紫砂的文化品位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紫砂进入官宦阶层,成为达官显贵品茗赏玩、珍爱收藏的器物。出自民间淳朴的造型,蕴藉地泥土气息的紫砂,渐渐融入了文人精神。与绘画、诗词、书法、雕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使这一民间陶器臻古朴高雅、经典凝练、声名鹊起。随时代演进,宜兴紫砂凝结着各种艺术的滋养,最终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独具魅力的一朵奇葩。

南宋主体文化的南迁,使宜兴紫砂获得了历史机遇。绵延至晚清,在这块丰饶灵秀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代紫砂巨擘顾景舟。在其出生的一个世纪,正是中国从农耕时代向工业化转型的大时代。以顾景舟为代表的一代紫砂人,置身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中,在塑造紫砂的感悟中,与时俱进,将紫砂工艺逐步规范、定法,在传统紫砂工艺中,融入了现代工业科学的严谨精神。使古老紫砂工艺增强了精密度,提升了艺术品位,丰富了紫砂独特的艺术魅力。进而使得世人的饮茶方式,随着紫砂器皿的升华,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最终确立了紫砂独立不群的文化品位。

来自紫砂故乡的作家徐风,从小便在紫砂壶、阳羡茶的氤氲中长大。当他将笔触潜进紫砂领域后,古老紫砂的无穷魅力,紫砂艺人特色的内心世界,强烈吸引着他陶醉其中。在创作了几部紫砂题材文学作品后,一个清癯狷介的身影日益清晰,充满感染力地站在他的面前。已故紫砂大师顾景舟的紫砂人生,令他敬仰、感动、向往,从而生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在研读了大量顾景舟的生平资料,寻访了几十位与其交往的人后,他又静下心来,对顾景舟留下的紫砂壶、诗文、刻字、制壶工具……反复品味琢磨体会,从中感受领悟顾景舟的心境气息,把握紫砂于手中的胸襟气度,在这种心灵交汇中,使他渐渐触摸到了一代布衣壶宗顾景舟那颗纯净、高傲、鲜活的艺术灵魂,心与顾景舟渐渐相通起来。通过采访、阅读、感受、体会,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紫砂的真谛内涵,更清晰地熟悉了顾景舟一生所负载的紫砂岁月。在此基础上,他才怀着对故乡紫砂的挚爱,对顾景舟的敬意,以舍我其谁的一种使命感,历经两年多创作,完成了这部35万字的《布衣壶宗——顾景舟传》。

在这部传记中,徐风以顾景舟坚守不移的紫砂生命为脉络,洋洋洒洒地描绘了一幅百年以来,与宜兴紫砂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类人物、各种命运和地域风俗画。将其学艺、制壶、创新、定法、卖壶、亲情、友情、爱情、人生际遇、情感纠葛、生命坎坷、艺术感悟,自然本色地映像在书中。同时将故乡宜兴的市井民情、地域历史、紫砂传承、奇闻异事、炎凉世态、社会变迁,引人入胜地呈现给读者。将丰富专业的紫砂知识,趣味盎然地娓娓道来,使人们在阅读此书时,仿佛置身在江南宜兴的地域时空,温润怡然的翠风中,耳畔传来古巷深处拍打紫泥的断续回声,远远地望见了顾景舟那沉静质朴、坚韧不苟的背影。

我以为,这部传记的重要文学贡献,是通过顾景舟一生负载的紫砂近代史,使人们对宜兴紫砂有了全面的了解,进而知道了以他为代表的一代紫砂人,以承前启后的历史担当,衔接古今、超越前人的气魄,将紫砂这一古老民间工艺转型到工业时代的历史进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介布衣的民间艺人顾景舟,终生不悔的对紫砂充满着坚定信仰,秉持操守、探索创新、淡泊名利的一生。

紫砂是宜兴人创造的一种泥土价值。古往来宜兴人始终将其奉为安身立命的一种地域手艺。壶道,成为了制壶人代代传承的道德规范。有谁践踏了这一道德规范,便会被世人所不齿。在这部书中,不乏顾景舟维护紫砂壶道的生动感人情节,同时又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紫砂的锐意创新,摆脱农耕文化粗放旧俗,运用现代工业科学理念的悟性先觉。在深刻理解紫砂历史与未来的高度上,他在原料配方、制作工具、工艺流程、图样设计上对紫砂加以创新规范,精细定法,有意识地在紫砂工艺中移植、借鉴多种艺术元素,以丰富紫砂的表现力,从而使古老紫砂在精致工艺、规范制作、艺术滋养中,散发着泥土气质、含蕴着时代气息、发展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器皿。宜兴紫砂在经历了漫长历史后,诞生了顾景舟这样一位智者,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紫砂人,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将原本散落民间,自然发展状态的紫砂工艺,推进到现代工艺的辉煌时代。

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经过一百年岁月的淘洗,让我们在今天更清晰地认识了顾景舟。观念正确的超越,是历史进步的原动力。经历过漫漶恣肆的宜兴紫砂,处于浮世之中的人们,面对顾景舟的紫砂人生,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

不过,李杭育在谈及这部小说的意义时说:“其实意义的着眼点在人和动物相互依存的感情。这个小说大量笔墨在写这个。”就是说他最初的眼点并非我上面所分析的那些,而是人和猪的关系。一方面,李杭育认为,猪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家”字的下面都是个“豕”,但却从来没人对猪的命运、生死有过认真的关注,所以他要写猪,因为猪也是一种生命。另一方面,他要写出底层百姓与动物依存中的温暖和孤独。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公猪案》同样体现了李杭育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变”与“常”。从小说的题材来看,李杭育虽然也有《故事里面有兔子》这种城里人生活的题材,但他更多关注的还是江南乡土中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书写福奎、耀金老爹们身上的无助感和孤独感,比如他的“葛川江系列”。《公猪案》虽然把叙事的触角伸到了更远的历史纵深,但其一如既往的关注和关怀的仍然是江南乡土中普通百姓的生存。

在谈及《公猪案》时,李杭育说:“故事是早就装在心上,但怎样讲它们,一直想不好。”他说之所以20年不写小说,是因为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超越从前的自由快活的表达方式。他要“突破文本制约,超越小说自身固有的诸多形式、套路的束缚”,从“文本的木偶与傀儡”变成“制约文本”。在这部小说中,李杭育通过“来福”和“旺财”这两个名字,把三个时代的三个故事交织在一起,既做到了意义与叙事框架的同构,同时,又使用“主观性魔幻”的写法,即“舍弃表面的、客观的魔幻,只以人物的精神状态来呈现魔幻”,让叙事自由地穿梭其间,达成了叙事的超越和结构的动能,确实非常成功。而且,由于摆脱了“一个主题,一个主要事件。通过梳理,想方设法把事件和主题联系上”这一“中国式写作”的瓶颈,也使得这部小说的主题具有了相当大的发散性,甚至它的许多细部同样是可独立承担意义的。

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杭育在小说艺术上的求“变”,但从他对小说艺术的认真这一角度上看,仍然是“常”,包括他对小说叙事语言的简洁、留白和江南韵味的追求上。

徐风《布衣壶宗顾景舟传》

□尹汉胤

生活的人 生活的书

□潘灵

李杭育《公猪案》:

“变”与“常”

□郑翔

在2015年《江南》第5期,已近20年未涉小说创作的“寻根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李杭育,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公猪案》。这或许不只是浙江文坛,也是中国文坛都已不敢期待的事。李杭育说:“《公猪案》积累了我20年来对人生、历史以及小说叙事艺术的思考,将会是我迄今为止在小说创作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那么,在这部自己如此看好的小说里,李杭育到底讲述了些什么?我想围绕“变”和“常”对其进行简要的评述。

《公猪案》讲的是辛县法院的楼法官下乡调查一起名叫旺财的公猪伤人的案件,结果这位喜爱民间掌故、趣闻轶事的法官,很快发现辛县在清代末叶、土改时期和当下先后有过三个叫来福的猪倌养过三头叫旺财